



【社会观察】

# 花钱高手做不出诺贝尔奖成果？

□文双春

很多物理学家是有人类情怀的悲观主义者——他们渴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但又不时对之表现出失望和悲观。悲观的根源可能在于物理学家习惯性地用客观规律或实践经验来审视和判断人类活动的趋势和最终结果,而人类活动具有高度的波动性和统计性,所以一段时期或某些局部表现出与客观规律或实践经验相悖在所难免,这时,物理学家就可能悲观了。

例如,2013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彼得·希格斯眼观时下科学界的论文崇拜现象,曾自嘲说,如今他已谋不到一个学术职位了,理由很简单:一方面,当招聘方要求他提供最近发表的论文清单时,他会如实回答——这个真没有;另一方面,招聘方评估他已没有足够的论文生产力了。他感叹:“很难想象,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中,我如何才能保持足够的安宁做出我在 1964 年那样的工作。”也就是说,在今天的科研环境中,他将不可能完成他的诺奖成果。

希格斯虽然说的是自己,但明眼人一眼就可看出,他在对现实表达出一种刻舟求剑般的不满和无可奈何的心理:今天的科研人员固然可以一个个成为论文高手,但要做出像他那样的诺奖成果是很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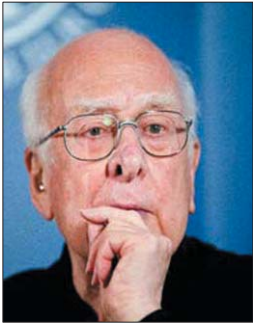
前不久,2011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索尔·珀尔马特在一次世界学术峰会上表达出类似的悲观看法:在今天的研究资助环境下,他不可能做出他的诺奖发现。这次,他悲观的不是论文崇拜现象,而是研究资助环境。他感叹,目前的资助气候意味着研究人员“非常擅于不浪费任何钱,同时也非常不善于做出任何发现”。

珀尔马特的感叹或许可归结为一个定律:花钱高手不可能做出重大科学突破。笔者推测,这一定律可能基于这一实践经验:任何科学上的突破都无法预见(1988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胡贝尔语)。而毋庸置疑,花钱高手必然是计划高手、预见高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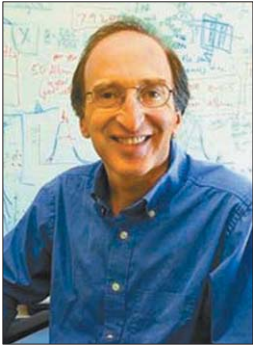
珀尔马特说,现代语境中这样的问题司空见惯:“你计划研究什么?你将在什么

时候完成它?你将在哪一天做出你的发现?”顺便插一句,我们的科研基金申请书中不都要回答这些问题吗?不旗帜鲜明地回答清楚,我们拿得到基金吗?

能够精确地回答这些问题,意味着今天的科研人员要么都是神,至少是半仙,要么早已突破“任何科学上的突破都无法预见”这个魔咒。



▲ 2013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彼得·希格斯



▲ 2011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索尔·珀尔马特

对他们来说,科学研究完全没有意外,一切尽在丝毫不差的掌控之中。

而珀尔马特回想自己花了 10 年时间做出使他得诺奖的发现,那纯粹是个意外。他说,这个项目通常由实验室的审查委员会管理,该委员会认为它“不符合该机构的使命”,幸好实验室的一个部门主任保证了该项目的资金。“最后,当我们开始看到令人惊讶的

结果时,该委员会说:‘这正是我们应该资助的。’”

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的资助环境中还会有吗?珀尔马特认为不可能有,因为“在一个你要管理好每一分钱并确保你不浪费任何钱的世界里,这将是非常困难的。”他说,人们忘记了你正在寻找的是巨大的惊喜和变革,这样的惊喜和变革使我们能够做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是可能的事情。

想产出诺奖成果应该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资助环境呢?在珀尔马特看来,我们能够做的唯一看起来可行的事情是,创造一个环境,其中人们充满思想,充满希望,且正在努力尝试许多想法。珀尔马特认为这种做法甚至可以被视为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家们只期望他们投资的一小部分是成功的。“你正在寻找那些罕见的、特别的投资,为此你必须广撒资源。”他说。

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为之担忧的论文崇拜现象和科研资助环境,在我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随着国人论文水平的提高,论文崇拜并未消退,反而在升级,一种典型表现是:国人只要在《自然》等所谓的顶尖刊物发表论文,不管其价值究竟何在,甚至不管其结果是否经得起质疑和检验,动辄被赞为“诺奖级”(国人发明的说法)成果,相关机构立马给官、给“帽子”、给钱。至于科研资助,“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当年的经费必须当年花完,否则收回,管理如此“过细过死”,世上可能绝无仅有。幸好,最近已有松绑迹象。可以说,今天的科研环境,更适合成就论文高手和花钱高手。如果两位诺奖得主的观点是真,那么意味着今天的科学界尽管高手如云,但已不可能产生诺奖成果了。

在笔者看来,其实不用这么悲观,因为诺贝尔奖肯定年年照发不误。它发给谁?除非发给外星人,否则,今天的科研人员照样可以得诺奖,而只要得到诺奖,就是不折不扣的诺奖成果。只是,两位诺奖得主的忧虑是否意味着,诺奖成果将一年不如一年或一年比一年水,就像“任何科学上的突破都无法预见”一样,的确不好说了。

(本文作者为湖南大学博士生导师)

## 从『坏人变老了』谈起

【生活直击】

□刘天放

也就是近几年吧,为老不尊的情景常见:老人见年轻人不肯让座,就对其拳脚相加;还有位老人索性坐在了一位不让座的女性的大腿上。针对“不敢扶跌倒的老人”这一难题,有些地方甚至专门出台了法律、法规加以引导。广场舞大妈经常把音乐声开得很大以致扰民,不但不听劝告,还恶语相向,甚至动手打人……

前段时间我去给一个比赛当评委,遇到一位参赛的老者。攀谈中,他自称是一个社区演唱队的,退休前就喜欢唱歌跳舞,退休后更是到处练歌练舞。我问他,周边居民意见大怎么办?他很得意地告诉我:不怕,因为他们拿我们没办法;他们越干涉,我们就把音量开得越大,然后他们就没脾气了……他的话令我愕然。我在购物时经常见到推购物车的老人不管不顾,甚至把购物车直接停在过道上与别人攀谈。还有一些老人大摇大摆走在前面是红灯的斑马线上,有人去跟他们讲理,反遭一顿辱骂……

于是有人说,这些为老不尊的人,其实年轻时就不是什么好人,只不过他们变老了而已;老人并非总是慈祥、善良、关爱、包容等的代名词。这样的老人不值得尊重,而应该受到严厉的谴责。的确,切割过去很容易,可难道没一点关系吗?“坏人变老”这个话题不缺新注脚。老大妈跳广场舞影响他人,就被泼粪、砸器材报复,这里我们既能看到当年英姿飒爽女民兵的身影,也能看到革命小将造反有理的痕迹。说谁是坏人或好人,下结论容易,使人信服难,世间不会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我绝不相信一个人只坏不好,或只好不坏。

老人本该明事理、辨是非,且德高望重。国人的记忆中,老人一般都代表着讲规矩、有礼貌、重品行。老人经常告诫晚辈不随地吐痰、不乱丢垃圾、不高声喧哗、不乱扔石子,不打架骂街,要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有吃相,长幼有别。哪怕一些不识字的老人,对读书、文化打心眼儿里敬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贪财,祸不来”“退一步海阔天空”“人要脸,树要皮”等都是很多老人的信条。可如今,好像越来越多的老人变坏了。于是,很多人开始怀念过去。是的,当年“造反有理”的那代人老了,但坏并不会因老而减弱。当年其价值观就是不讲规则、不择手段。给他们提供价值观和精神养料的年代,确实令其无法切割,已深植其中。

然而,过去也要看多远。太远的不论,目前 60 岁以上的老人,基本上都经历过数轮政治运动。而这些运动曾把人性中最恶的部分释放了出来。其成长经历,无论物质还是精神,只有“匮乏”二字。且不说“文革”或其他政治运动,仅一个“三年困难时期”就让其患有“匮乏恐慌症”,且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医治。精神匮乏,相比物质匮乏更甚!物质长期匮乏导致的生存压力,加上“狼奶”教育中喂养出的丛林法则式的价值观,哪还有什么规则和底线?唯一有的就是嗓门甚至拳头。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理智和文化的缺陷。这批老人不习惯多种声音的理性辩论,而是习惯于一言堂。这些老人读了多少有益的书籍或经典?多数没有。这些老人成长的时代,就是一个没有理性的年代、文化断裂的时代,夫妻反目,师生翻脸,儿子检举老子……再让其回归正常需要时间。这也是目前为老不尊的时代背景(其中当然也有善良和正直的老人)。

更糟糕的是,变老的“坏人”正在突破底线。想要重拾道德底线需要经过多年的积淀。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对未来充满信心。小孩子中不是还有那么多“熊孩子”吗?几个为老不尊之人,不可能永远是世之常态。季羡林先生就说过,一些坏人随着岁数的增大,总是会慢慢变好的(大意),虽然这个“变好”的过程漫长而艰难。因此,对老人存在的种种问题,该纠正的还是要纠正,不能因为在“尊老”的光环下,就几乎无条件地轻率服从。其实,当我们需要正儿八经来论证“坏人变老”这个社会问题的时候,这个社会就病得不轻了。当老人轻易能从和善、慈祥、宽容、智慧堕化到贪婪、卑劣、无耻、恶毒的时候,不给他们变坏的机会,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这恐怕要靠法律和制度来解决问题了。现实中,过多指责已变老了的坏人,无济于事,应该做的是如何采取措施,保证人干不了坏事、不敢干坏事,即使变老了也一样,这也应该是全社会的共识。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副教授、文化学者、自由撰稿人)